

巾帼红军 忆长征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下

 中共党史出版社

巾幗紅軍憶長征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編

下

 中共黨史出版社

征途漫忆话巾帼

刘坚

红四方面军的妇女队伍是一支人数众多、素质良好、革命热情很高的巾帼劲旅。它的成员大部分是来自四川北部通（江）、南（江）、巴（中）一带的贫苦劳动妇女。参加革命前，她们挣扎在生活的最底层，不仅要忍受军阀混战、地主剥削带来的痛苦，还要承受公婆、男人的欺凌和虐待。非人的待遇，养成了她们吃苦耐劳、不避险阻的性格，更使她们具有强烈的翻身愿望和革命要求。1932年底，当红四方面军入川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广泛开展扩大红军运动时，这一带的许多贫苦妇女，纷纷冲破封建樊笼，踊跃报名参军参政，使四方面军的妇女队伍不断扩大，成为一支支持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的重要力量。

1935年，我在川陕省委任妇女部长。当时，红四方面军拥有妇女2000多人。主要集中在妇女工兵营（1933年成立，营长林月琴，政委王泽南）、红四方面军总医院（1933年成立）、新剧团、妇女独立团（1934年成立）、省委妇女部和妇女学校（1934年成立，校长刘桂兰）等部门中，担负着保卫机关、制作被服、运输物资弹药、医治伤病员、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培养妇女干部等多项工作。因为处于战争时期，一切工作都是为着巩固和扩大红军，为着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而展开。参加红军的妇女，既是参与军事斗争的女战士，又要担负起大量的地方工作，一身数任。这是特殊的历史环境赋予我们革命妇女的一种殊荣。

1935年3月下旬，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发起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妇女独立团、省委妇女部及妇女学校等单位的大部分女同志，跟随省委机关在苍溪渡过嘉陵江，踏上了艰难而漫长的长征路途。

长征开始后，由于脱离了川陕根据地，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头开始。妇女们肩上的担子也随着新的形势和任务而加重了。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行军赶路，起初是为了和中央红军会师，尔后是南下，失利后又再次北上。在行军途中，妇女所担负的主要任务是抬担架、背枪支弹药和沿途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抬着担架长途行军真是件苦差事，尤其是遇到路不好走的时候，更是如此。长征中所走的路，多半是崎岖险峻的小路，有时甚至无路可走。百丈关一仗失利后，我们被迫北撤，伤员增多，天降雨雪，在天全、芦山泥泞的田埂小道上，抬伤员的妇女经常滑倒在水田里，弄得满身泥水。接着从宝兴到夹金山的路，更是难行。这里，一面是陡峭的悬崖峭壁，一面是山谷中急湍的川流，脚下所谓的路，其实是打柴人走的羊肠小径，途中不时还有半人高的沟坎和巨石拦路。在这样崎岖险峻的地形上抬着担架行进，一不小心，就可能摔下山谷，被急流卷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次行军都派出几名女同志到前面探路，遇到沟坎或巨石阻挡时，就站在旁边提醒，接应后面抬伤员的同志。抬伤员的同志们上坡、下坎、拐弯时，叫着号子，协调动作。每副担架配备四至六人，轮流替换，以保持体力，行军不减速。大家一路上互相照应，互相鼓励，硬是冒着风雪，把一截截空手尚且难行的山路远远甩在身后，第二次征服了夹金山。由于我们组织工作做得细，团结互助精神强，因此我们这一路的女同志（指省委妇女部、妇女学校、妇女独立团等）在二过夹金山，重返懋功、丹巴的这段路上，没有一个掉队，也没有丢掉一个伤病员。当时有不少男同志都被妇女们的顽强作风感动了，说：“四川的女娃子硬是厉害哟！”

从丹巴出发开始过党岭山，它比爬夹金山还要艰难。山虽不算陡，

但平均海拔却很高，一路都是上坡，走起来很是累人。加之山上常年积雪，气候恶劣，更给运送伤员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每向前迈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有时走不到100步就要换人抬。这时，我们就分配十几个人轮流抬一副担架。有的同志走着走着就累倒了。碰上这种情况，旁边的同志得赶快抓一把雪塞进她的嘴里，再在脸上打几巴掌，架起来就走。要是任她躺在地上，就没命了。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挪着，好容易才挨到山顶。下山的时候，我们把绑腿解下来，绑在担架的两头，前拉后拽，旁边再安排两个人保护，顺着坡向下滑，比上山时轻松多了。到了山脚下，有的伤病员看见我们女同志的肩膀渗血肿起老高，脚板底打满了血泡，感动地说：“把我们丢下吧同志姐，我们再也不能拖累你们了。”女同志听了，掉着泪回答道：“你们为革命挂了花，我们怎能扔下你们不管呢？只要有我们在，就决不会丢下一个伤员。”我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从天全、芦山到道孚、炉霍的路上，确实遇到了不少艰难险阻，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伤员。我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始终没有丢失一个伤病员。这充分体现了四方面军妇女干部战士们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朱老总曾经表扬我们：“四川的女娃子，是一支坚强的队伍。”

如果说抬担架仅是力气活的话，那么，在长征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就可称之为“艺术”了。而从事这门“艺术”活动的大都是女同志。四川女孩子嘴巴利索，嗓门大，作风泼辣，天生是做宣传鼓动工作的好手。每次部队行军前，我们通常派出一两支妇女宣传队先期出发，赶到部队即将经过的大路旁或山腰上，作一些简单的准备，待部队路过的时候，就起劲地唱莲花落，数快板，当啦啦队，想方设法地活跃气氛，给部队战士鼓劲。这么做效果很好。行军的战士们每逢遇到有宣传队鼓劲的时候，情绪总是比较高昂，有时还跟着学唱起来，消除了不少疲劳。在过党岭山的时候，宣传队员们站在半山坡上唱道：“党岭山，三百三；路难走，山难翻，山高，高不过我们的脚背；路难走，难不倒我们两条腿。

大家加油赶快翻，翻过山去有温泉，……”等到大部队过去后，她们又成了收容队，帮助掉队的同志背枪背粮，鼓励他们加把劲赶上部队。长征途中，在最难走的路段上，总是能听到女宣传队员们充满鼓舞性的歌声。她们的乐观精神，感染着前进的队伍，使漫长而艰险的长征路途变得富有生气。

筹粮筹款，做群众工作，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和成立各种群众组织，是妇女干部战士们在长征中肩负的另一项重任。

在长途行军中途驻扎的短暂期间出外筹粮筹款，是一件困难而危险的任务。记得长征刚开始不久，我带着妇女部和儿童团、少先队的70几名女同志，跟随前方省委书记谢富治从杂谷脑前往黑水、芦花为三军团筹粮。待我们把粮食背回来时，三军团已经开拔，谢富治也走了，只留下张条子，叫我们跟着一支部队赶到毛儿盖去会合。我们匆忙上路，在途中经过一个山沟时，前面传下口令，要我们一个挨着一个走，不要分散，不要掉队。因为两边的大山上藏着受国民党谣言蒙蔽的藏民，经常向我们打冷枪。见到人少，就冲出来用马刀乱砍，前面已有不少同志被杀害了。我们70几名同志遵照口令，沉着而警惕地紧步跟上，冲过了这个危险区。但还是有一个同志受了伤，后来因伤口发炎，不治而牺牲。

部队越往西走，筹粮就越发困难，尤其是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之后，更是如此。在进茂县（今茂汶羌族自治县）之前，我们和敌人打了一仗。敌人撤走之前进行了许多破坏。我们进城时，老百姓几乎跑光了，家家户户紧闭着门，偶尔碰到几个人，也是见到我们就躲，工作很难展开。针对这种局面，我们将妇女分成七至八人一组，带上通司，分头到深山里去喊话，宣传红军的政策，请他们放心回家。有时一天做不通，就接连做几天。搞不到粮食时，两三天吃不上一口饭。饿急了就喝口冷水，工作还得照样做。后来有的老百姓被我们感动了，就偷偷跑来告诉我们有钱人在哪个山洞里藏了钱粮。为了不使他们受到牵连，我们通常要绕道而行，有时为了背回一点粮食，要绕上大半天的路程。在往卓木碉去

的路上，再也搞不到粮食了，我们只好趁队伍中途休息时，去路旁收割过的青稞地里拣点粮食。在天全，有一个叫吴顺英的女同志单独外出筹粮，被地主家的狗腿子绑了起来，准备杀害，幸亏那家的长工跑来报信，我们及时赶去才把她救了出来。类似这种情况，在筹粮过程中时有发生。但是不论怎样困难和危险，妇女们从来不叫苦，不畏难，总是满腔热情地去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大家心里想的是，只要能完成党交给的工作，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吃点苦、受点累算得了什么。

发动群众，宣传红军的政策，帮助地方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和成立各种群众组织的工作，是随着长征的开始就展开了的。当时的情形是，部队打到哪里，我们的群众工作就做到那里，政权建设就跟随到那里。真是走一路撒播一路革命的火种。

我们每到一地驻扎下来之后，妇女干部都要下去帮助地方成立各级苏维埃政府。通常是成立乡、区、县三级政权。其中，乡苏维埃设内务委员兼管妇女工作，区委则配妇女部长和妇女巡视员，县委有妇女部长，负责全县的妇女工作（县、区的妇女部长一般由省委妇女部或妇女学校派出），上下形成一条线。妇女干部在地方政权的建设当中，还是起到了半边天的作用的。此外，妇女们还要负责成立各种群众组织，如：妇女会、儿童团、赤卫军等。地方政权和各群众组织建立之后，我们还要向下面的干部交代各项政策，帮助、带领他们开展工作。

在少数民族集中的川西地区，我们带着通司，深入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消除他们的疑惧心理，帮助成立“波巴依得瓦”（藏族人民政府）。我们在丹巴、道孚、炉霍、甘孜，都成立了这种政权。

在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群众工作，情况十分复杂，要因地制宜，为适应新情况的需要，这就需要我们女同志不断地学习，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记得在许庆一带，民风恶劣，男人大都好抽大烟和嗜赌。有的人家很穷，因为吸大烟和赌博把家产甚至老婆卖掉了，但还是要

抽，要赌。我们到了之后，就分头下乡、上街，宣传抽烟、赌钱的害处，广泛开展戒烟、禁赌运动，把那些沾染了坏习气而又难以自拔的人集中起来，强迫他们改邪归正。结果，很受群众，尤其是妇女们的欢迎。在我们严厉的强迫措施下，不少人戒了烟，改掉了赌博的坏习气，有的后来还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了地方干部。这样一来，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高了。

当时，我们外出做群众工作条件很艰苦，什么东西都没有，靠的就是两条腿、两只手和一张嘴，长途行军下来，没有休息多久，一接到任务，马上就挎上马刀，有的还带上两个马尾手榴弹（当时大多数女同志的武器装备就是如此），就出发了。遇到部队行动出发，就要赶快派人通知她们赶到指定地点，跟上部队继续长征。有的因为工作地点偏远，通知得不及时，赶不上部队，就被敌人捉去杀害了。在那样艰苦恶劣的环境下，我们妇女干部战士就是这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甚至献出年轻的生命，把党的主张、红军的影响，一点一滴地渗透到群众中去。为扩大中国革命的民众基础，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长征，对女同志来说，是一种超负荷的艰难跋涉。它使我们付出了青春、健康，甚至鲜血和生命。但是，另一方面，长征又使我们受到一次前所未有的教育和严峻考验。在这场教育和考验中，我们深深感受到红军这支革命队伍，充满了温暖和阶级友爱，从而更加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同红军和革命紧紧结合在一起。前面说过，红四方面军的女同志大多是来自川北农村的贫苦劳动妇女，其中许多人出身童养媳。过去在家里过的是牛马不如的日子，稍有反抗或逃跑，捉住了不仅要挨顿毒打，还要遭受小腿肚子被割开塞进盐巴的野蛮酷刑。参加红军后，她们摆脱了悲惨的命运，走上了一条解放自己又解放他人的崭新的人生道路。在长征途上，这些贫苦出身的妇女干部、战士，上上下下，打成一片，发挥出巨大的革命热忱，靠官兵一致、团结友爱、领导带头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战胜了无数个困难。在我们的队伍中，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凡是要求战士们做到的，我们妇女干部都必须首先做到。

林月琴同志是鄂豫皖过来的老同志，曾担任过妇女工兵营营长。长征中，她不计个人得失，样样工作带头干。她的脚小，但在背粮时总是背得最多。战士们见了对她说：“营长，你的脚小，路又不好走，少背点吧。”她笑着回答：“我多背点，年小体弱的就可以少背点，大家走得也好快点。”有些身体好的女同志先到达宿营地，转回去要替她背一段路，她总是和蔼地叫她们去帮助别的同志。她对待同志像亲姊妹一样，做起工作来又细致又深入，有的战士说：“我们营长真是比我母亲还要好！”

刘桂兰同志，在长征中是妇女学校校长。她带领妇女学校的学员、干部下乡筹粮筹款，发动群众，成立地方政权，为部队运送枪支弹药，打扫战场，抬担架，负责省委机关的警戒……样样工作都以身作则，布置得有条有理，不仅充分发挥了妇女干部的积极性，而且使她们的工作能力受到很大的锻炼。张琴秋同志夸奖她：“把妇女学校办得真好！这些人将来出去都能单独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

王昌德同志，长征时任省委妇女部巡视员，整个队伍中数她最活跃。在行军中她从来不知疲倦，一会跑到前边做宣传员，一会跑到后面当收容队员，她会唱莲花落，遇上掉队的同志走不动了，她就一边上去帮她们背枪背粮，一边顺口唱着自编的小调：“上山脚杆子软，下山脚杆子短，平路道好走，弯弯也难转。”一边唱一边表演，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忘记了疲劳，路也走得快了。她为人热情，对待同志好像一盆火。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有，随时都可以拿出来送给人家。身上有两件衣服她会脱下一件给衣服单薄的同志穿；袋中有一口炒面也要拿出来和大伙分着吃。同志们都说：“昌德心中只有别人，没有自己。”

像她们这样的妇女干部，在四方面军中还有许许多多，她们的感人事迹几天几夜也说不完。虽然这些妇女干部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但她们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着我们的队伍中的每一个同志，使这支队伍成为一个充满团结友爱气氛的温暖的大家庭。有了这样一个可爱的

集体，长征中最难克服的困难被我们战胜了，最难走的路被我们踩在了脚下。

长征是艰苦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长征中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的，恰恰相反，那时，即便在长途行军中，我们的生活既丰富多彩，又充满革命意义。除了工作和开会外，晚上有空时，妇女干部都要集中到妇女学校上课，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或者文化知识。当时何柳华同志（即廖承志）给我们讲“列宁主义概论”、“苏维埃政权建设”，张琴秋同志讲“国际妇女运动”、“三八节的来历”，何长工同志讲“法国妇女运动”。记得还有罗世文、朱光、傅钟等同志也给我们讲过课。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我们还要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党的民族政策。此外，还要上卫生课。行军虽然艰苦，妇女们学习文化的劲头却很大。有时认了几个字怕忘记，行军时就在前面走的同志的背上挂一小块布，上面写着刚学会的字，一路走一路记；到休息时，就拣个树枝在地下默写。不少人用这种方法认了不少字。

四方面军的女同志大都比较年轻，活泼乐观，身体也比较好。在行军路上，大家走在一起，不是你唱段家乡小调，就是她讲段笑话，气氛搞得很活跃。队伍休息时，我们也不甘寂寞，要么大家一起学歌，要么就拉那些会表演的同志给大家出节目。张琴秋同志就曾经给大家跳过俄罗斯舞。在少数民族地区，有的人还向藏民学会了一种藏族舞蹈“糌粑粒粒亚西亚”。1936年春，方面军越过党岭山，方面军总部和省委机关驻扎炉霍一个多月，进行休整，在这里开了一个“五一”运动会。会上，妇女们踊跃争先，夺得了不少好名次。记得女同志唱歌得了集体第一，陶万荣同志在男女混合赛马比赛中获得冠军，我在女子跳高、跳远中拿了第一名。

1936年7月，我们第三次越过茫茫草地，向甘南挺进。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在10月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长征胜利结束了。

到达会宁时，四方面军大约有女同志 1000 余人。据我了解，方面军女同志在长征中的减员，除了伤亡、病故和掉队迷失的以外，在川西一带我们还留下了几百名妇女在当地照看伤病员。参加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这部分历经千辛万苦而保存下来的优秀妇女干部、战士，后来在西征军中被打散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每当我回首当年红四方面军的妇女所走过的漫长征程，眼前就会浮现出红军女战士在雪山、草地上艰难跋涉的身影，心里自然深深地怀念起那些长眠在长征路上的阶级姐妹。我常常想，无论对死者或是对我们这些幸存者而言，当年的那段光辉历程已经成为历史而永久地载入了史册。能够使我们感到安慰的是，我们没有虚度自己的青春，我们曾经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妇女的解放，谱写过一曲悲壮的凯歌。就这点而言，我们无愧于后代。

仅以此文献给红军长征胜利 50 周年。

1987 年 4 月于广州

选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251—258页。

刘坚，原名肖成英，1919年生，四川通江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时任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军区后勤部副政委、湖南省政协常委、广州军区直属政治部副主任（副军职）、广东省政协常委等职。2005年在广州逝世。

长征中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

华全双

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行列里，有一支英勇顽强的妇女武装——妇女独立团。她同当时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妇女一样，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长征中，她们同男同志一道，凭着坚定的革命意志，惊人的毅力，爬雪山，过草地，行军、作战，完成各种战勤任务，历尽艰辛。我曾经在这支妇女武装部队里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每当回顾这段经历，战友们那种坚韧不拔、勇往直前、团结友爱和高度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形象，就浮现在眼前，使我仿佛又回到了这光荣集体的怀抱。

1934年五六月份，川敌刘湘等部对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方针，待机破敌。这时，根据地边沿区大批妇女干部撤回中心区来。为适应形势需要和广大妇女群众武装的要求，方面军总部决定将原妇女独立营扩编为妇女独立团。团下辖三个营，1200余人，张琴秋（后曾广澜）任团长^①，直接受方面军总部领导。妇女独立团成立后，立即担负起艰苦的战勤工作和警卫后方机关、清剿土匪的任务。

妇女独立团从领导到勤务员、炊事员、司号员，都是身强力壮的女青年，大部分是党、团员。少数同志是鄂豫皖来的，多数是四川人。军

^① 关于妇女独立团成立初期的领导，还有曾广澜任政治委员，另有一男同志负责指挥军事；或曾广澜任团长兼政治委员等说法——编者注。

事生活，沿袭妇女独立营的做法，和男同志一样，剃光头，穿军装，戴八角帽，打裹腿，穿草鞋，背子弹袋，每人一杆马枪、两个手榴弹；天天操练，如队列、射击、刺杀、投弹、夜行军、进攻防御战术、夜袭等。崭新而紧张的生活，使得女战士们处得十分亲密，尤其大家围在一起擦枪时，谈笑风生，歌声不断。在党的教育与关怀下，女战士们的政治觉悟也迅速提高。

1935年2月，在旺苍坝将妇女独立团扩编为妇女独立师^①，辖妇女第一团、第二团，张琴秋任师长。全师2500余人，直属总部领导。妇女第一团团团长王传野^②，第二团团团长刘伯新、政治委员曾广澜。

这一年的3月28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揭开了长征的帷幕。29日，总部命令妇女独立师第一团随中路（红三十军和红九军一部）行动。31日，中路纵队攻占剑阁。妇女第一团配合三十军八十九师守剑阁城，阻击敌援兵。经两昼夜激战，击溃敌田颂尧一个旅，敌旅长及其小老婆被妇女团俘虏，同时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和其他战利品。

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前，后方医院有1000余名伤病员，其中500余名需要用担架转运渡江。妇女独立师接受了这一任务，由二团和一团的一部分负责抬担架，转运伤病员。

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后，红军控制了北川、梓潼、青川间纵横二三百里地区。这里是新解放区。部队就地休整，发动群众，筹粮，扩大红军。妇女第一团在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和川陕苏维埃副主席余洪远率领下进驻中坝，参加宣传队和工作队工作。开始，老百姓不许我们进妇女的屋子，以为我们是男人，后来知道我们是女兵，妇女们又惊奇又羡慕，都欢迎我们去住。我们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江油等地人民群众对红军长征、对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应该永远怀念的。

5月中旬，方面军为打破蒋介石围堵、夹击的企图和策应红一方面

① 傅钟等人曾回忆，妇女独立师并未正式成立——编者注。

② 一说团长由张琴秋兼任——编者注。

军北上，部队先后撤出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西向岷江地区。

妇女第二团的战士们转运伤病员，从旺苍到剑阁，又到川西北的茂县（今茂汶羌族自治县），路程千余里。一路攀山过川，道路艰难，有时几乎没有路。在这种地形上莫说抬伤病员，就是空手行走也是非常艰难的。女战士们虽不是富有人家的千金，可抬担架还是第一次。一天要走八九十里路，人不能丢，粮食不能缺。开始感到很吃力，肩头压得又红又肿，火辣辣地难受。但大家为了阶级兄弟，拧成一股劲，时间长了，也就锻炼出来了，当时没有现成的担架，就用竹子，后来用青杠树干做杠，葛藤作网。伤病员铺着我们的被子，盖着我们的衣服。路上没有护士护理，洗伤口、涤血衣、饮水、喂饭，都由我们承担。为了不让伤病员饿肚子，就用裤子装满粮食，挂在脖子上，扛着粮食，抬着伤病员走。休息时，给伤病员演唱自编的小节目，解除他们的痛苦。川西北的山路崎岖险陡，坡崖重重，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悬崖。有的同志就是这样牺牲的。为了安全，我们效仿四川抬滑竿报路的方法，前呼后应，步调一致。比如上坡，前头人唱“坡上又加坡”，后面人应“小心慢慢梭”。遇到泥坑，前呼“路头一泡泥”，后应“脚下要仔细”。拐弯，前呼“前面大转变哪”，后应“两手扶紧担架杆哪”。若是急转弯，前呼“慢转十字拐”，后应“前摆后不摆”。于是，后面的同志立即站稳，等前面的同志转好了，后面的同志再转。平路时，前唱“天上一朵云”，后应“走路蹦蹦平”。有时也呼“平阳大坝”，“扯起两下”（快走的意思）。这样行进，既安全又精神，疲倦也就都忘了。后来，主力部队行军时也学唱起来，气氛活跃，精神抖擞。遇到敌人，我们一面警戒一面绕行，从荆棘丛中钻来穿去，许多同志身上被荆棘刺出了血。伤病员感动地说：“小妹妹们，快把我们放下吧，不要为我们叫你们受这样的折磨了！”女战士们说：“我们都是阶级兄妹，受这点累算什么，救得你们能打敌人！”一次遇到敌人空袭，一颗炸弹看着落了下来，战士苟贵英同志扑在伤员身上。她英勇牺牲了。被救活的伤员是一位指导员，哭得泣不成声。周

围的伤病员眼里也都涌出感激和复仇的泪水。

6月，方面军驻镇江关、茂县、理县、威州一带。这里是汉、藏、羌、回等民族杂居地区。妇女独立师在执行后方警卫、维护交通治安、为部队筹集粮食任务中，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藏、回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为了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女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访问贫苦群众，帮助群众劳动生产，做家务活，深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她们还刻苦学习藏族语言。女战士们的实际行动教育了少数民族群众，解除了他们对红军的疑虑。

但是当地也有少数藏族反动头人，与国民党特务勾结，纠集匪徒扰民作歹。在杂谷脑以北四五里大山上的一座喇嘛庙里，窃踞一股匪徒，杀人放火，抢掠牛羊财物，骚扰当地群众。红军到来后，散布谣言，欺骗群众，袭击红军和我地方政府机关，严重妨碍我开展地方工作。红军多次对其说服教育，做争取工作。但这股顽匪依仗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负隅顽抗，继续作恶。群众的痛苦，同志的牺牲，激起了红军女战士的怒火，请求上级批准消灭这股匪徒。方面军总部批准了女战士们的请求，并派来总部机关少数兵力和妇女党校、省委妇女部保卫队协助。

妇女独立第二团的干部去看地形。庞大的寺院坐落在半山腰上，绿瓦灰墙，狮、豹、虎、象等雕刻，虽然离得远看不清，但那个模样可以想象得出，敌人居高临下，我们从山下仰攻是要吃亏的。团长说，咱们兵分三路，两路由正面佯攻，一路爬到寺庙后面，从山上往下压，怎么样？大家都同意。作战方案就这样定下来了。

天一黑，主攻部队攀藤条登峭壁，向寺庙后面迂回。正面佯攻的部队开始挖工事，一条条堑壕像蜘蛛网似地伸向寺院。天漆黑，静悄悄的，只有沙沙的挖土声。平素爱说爱笑的小鬼们，此时都收起了笑容。第二天拂晓，战士们伏在堑壕里观察匪徒们的部署和动静。

庙门紧闭，里面鸦雀无声。很明显，敌人企图凭借墙高壁厚、粮弹充足，守在庙里同我们对峙。

入夜，正面两路先以小部分兵力发起攻击。匪徒们见我们攻击力不强，毫不在乎，不紧不慢地还击。后来看我们不像真进攻的样子，就打开寺院大门冲了出来。我们依托堑壕，远的用机枪打，近的手榴弹炸。敌人第一次反击被打退了。接着又一次反击。我们机枪、步枪、手榴弹、石头，一起向敌人打去。这时寺院后山上响起了枪声，我们的主攻部队从山上压了下来。敌人腹背受攻击，顿时惊慌失措，连忙退进庙里，关上庙门，三路红军战士把寺院团团围住，敌人向外突围几次，均未得逞，只好龟缩寺院内。妇女二团二营奉命突击寺院大门。六连连长刘国英抱着炸药包，在敌人火网下，冲向寺门。敌人见势不好，便放火烧寺内的粮食、物资。刘国英同志半路中弹，身负重伤，但她以顽强的毅力终于炸开了寺院大门。女战士们跃出堑壕，高呼着冲进寺院，将寺院内的残敌或击毙或俘虏，扑灭了大火，缴获了大批粮食、盐巴、酥油、牛羊肉、藏布、枪支弹药及其他物资。战后，妇女独立师受到了总部的嘉奖。

在方面军积极进行欢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准备工作的日子里，女战士们个个大显身手，精心绣制、缝制各种慰问品，如针线包、烟荷包、袜子、衣服等。物品虽小，但渗透着对党中央的崇敬、对红一方面军的兄弟姐妹情谊。两军在懋功会师后，妇女独立师对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慰问演出等活动。

由于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错误，红四方面军二次过草地南下。部队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女战士们的足迹。

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中，妇女独立师配合主力部队在宝兴灵官镇和芦山县作战，接连取胜。我军十天连克宝兴、天全、芦山，控制了川康边广大地区，造成了东下川西平原，直掠成都的态势。敌人急调80余团兵力阻击红军。百丈一战，七天七夜，由于敌我兵力悬殊，我军伤亡近万人，妇女独立师损失也很大。

战后，部队在天、芦、宝、丹（巴）一带与敌对峙。妇女独立师以第一团的一个营，随总部兵站部，为前方作战部队筹集粮食和过冬

物资，其余部队投入赶制全军冬装的任务。筹粮分队深入藏族山寨，联络土司、头人，把筹集到的粮食、物资身背肩挑到前线，又从前线把伤病员抬到后方，然后再深入山寨去筹粮。在运粮的路上，经常遇到武装匪徒截击抢粮，女战士们立刻放下粮食，端起枪，投入歼灭土匪的战斗。赶制冬装的战士们，纺线、织布、染色、缝制，虽制出大批军服，但仍不能满足部队的需要。于是，派出一部分同志深入山林，寻找棕树，割棕做棕衣御寒。割棕，要先砍荆棘开路，棕树有的又高又大，要爬到树顶，一不小心，就从树上摔下来，或划破了皮肉，或摔坏了腿脚。有的同志被毒蛇咬伤，因无医药抢救而牺牲了。割棕回来，分到各连队进行编织。没有钢针，就用竹针代替。为了完成任务，大家日以继夜。晚上灯少，就十几个人围着一盏油灯。许多同志不顾疲劳，忍饥耐寒，熬红了眼，累弯了腰，为了前方战士早日穿上棕衣，辛勤劳累，没有一句怨言。

1936年2月，部队西进道孚、炉霍、甘孜，要翻越党岭山。总部抽调妇女独立师一部，随前卫部队清除冰雪，疏通道路。漫山皑皑积雪，使人睁不开眼，站不稳脚。高原地带，空气稀薄，呼吸十分困难。冰冻的山地犹如钢板一样坚硬，一镐刨下去，只能崩出一小撮冰碴。遇到陡崖峭壁，就用绳索把人吊到半山腰铲凿。白天开路，夜晚搭个简单棚子御风寒。尽管任务极为艰难，女战士们还是按时完成了开路任务。

到达炉霍后，方面军休整训练，接应二、六军团北上。这期间，部队进行了整编。妇女独立师因南下转战减员，只剩下千余人。总部命令妇女独立师整编为妇女独立团。团长张琴秋，后王泉媛，政治委员吴富莲，特派员曾广澜，参谋长彭玉和，政治部主任华全双。

红二、六军团北上消息传来后，妇女独立团投入了迎接红二、六军团的热潮中。女战士们设法收集羊毛、羊皮，精心编织毛衣、毛袜、草鞋，赶制皮衣和各种慰问品，以便献给远征而来的战友。两军会师后，我们还为二方面军运送粮食，照顾伤病员，并热情地组织慰问演出。